

刘知侠与刘真骅的爱情传奇

“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，微山湖上静悄悄……”刘知侠的这部红色经典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曾广为流传。他与刘真骅的爱情故事，也成为夫妻志同道合、琴瑟和谐的典范。

“知侠是个好人”

1968年，刘真骅32岁，从机关下放工厂后，她一个人带着6岁的女儿住进了单位宿舍。此时，她从不幸婚姻中解脱出来，已整整5年。

她躲避着男人们的殷勤，和女儿深居简出，靠读书排解愁绪。即便如此，她仍然难逃流言蜚语。年轻貌美，单亲妈妈，在济南市郊的小工厂里，无疑是最好的谈资。

有一天，在山东文联工作的表姐夫来了，有意无意地，他说起刘知侠。

刘知侠的遭遇，几乎全省皆知。尽管靠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红遍全国，可是他没有躲过厄运，在特殊年代遭到不公平对待。更不幸的是，妻子刘苏因出车祸去世，留下6个未成年的孩子。

表姐夫的意思，刘真骅当然懂。她从小喜欢文学，刘知侠的《铁道游击队》读了多遍，可是对他，她当时只有同情。一来，他比她大18岁；二来，她没有勇气做他6个孩子的妈妈。

失败的婚姻令她自己心有余悸。18岁时，为了给母亲治病，她早早就嫁人，生了一双儿女，可那婚姻对她来说犹如牢笼，直到9年后才终于解脱。

那晚，她久久无法入睡，索性摸出一本书来看。很巧，是刘知侠的《铁道游击队》。

第二天，刘真骅还是去和刘知侠

见了一面。第一次见面，却给她留下深刻印象。沙发上有个人朝她走过来，说：“你终于来了！”面前站着的正是刘知侠。中等身材，体格健壮，面容憨厚，平常得像个邻家大哥。“还需要介绍吗？”他的爽朗，瞬间拉近了彼此距离。

他送她回工厂。细雨蒙蒙中，他把大手放在她的手上：“以后你不会孤独了，有人跟你一起走！”

心灵一阵震颤，刘真骅的脑子一片空白。见她不语，刘知侠笃定地望着她说：“我只要你记住一句话就够了：知侠是个好人！”

“你在我心里放了一把火”

对刘真骅，刘知侠一见钟情，他展开了追求，而刘真骅也开始逐步了解他。

刘知侠是河南卫辉人，家境贫寒，少年时学业断断续续，20岁时怀着革命热情奔赴延安，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。

毕业后，刘知侠到了山东。在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被日军“围剿”时，他两次突出重围。1943年，刘知侠调到山东省文协。这年，滨海抗日根据地召开全省战斗英雄模范大会，刘知侠在会上结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们，被他们的战斗事迹所感动。他决定把这些英雄事迹写成文学作品。他两次闯过敌人封锁线去鲁南的枣庄和微山湖，到铁道游击队中深入生活，为长篇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收集了丰富的素材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刘知侠成为专业作家。不久，他的长篇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出版并风靡一时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。

刘知侠丰富的人生经历，成熟的

外表，慢慢吸引了刘真骅。

从此，月光下，他们有了约会，像个储水库一般，对她的苦难和烦恼，他全部容纳。爱，像灵丹妙药，治愈了伤痛。刘真骅苏醒了，她恢复了青春的活力。

有一段时间，刘知侠被下放到农村，但他和刘真骅之间没有断绝书信来往。

在信中，她热烈地向他告白：“有了你的爱，我再也不需要任何温暖；有了你的支持，我就有了坚强的靠山。你已经在我心里放了一把火，这火在燃烧，很旺……”

而刘知侠内心的爱火，燃得更旺。每次他都会一边亲吻她的照片，一边读她的信，回味他们在一起的分分秒秒。

书信，就是精神食粮，洋洋千言、万言，温暖着历尽磨难的心。那些信件，刘真骅都细心珍藏，装订成册，160万字的情书，成为她后来走上作家之路的基石。

刻骨铭心的爱恋

1972年，经过4年苦恋之后，不顾当时许多人的反对，刘知侠与刘真骅宣布结婚。这年，他54岁，她36岁。

婚后，在刘知侠影响下，刘真骅开始创作小说、散文。1986年刘知侠定居青岛后，起初他和刘真骅在市政府宿舍居住，但环境的嘈杂和人事的往来使他不能安心写作。他到西镇一个老同志家里借得一间空房写作，每天步行四五里，中午两个包子，一壶开水，后来他们才搬到金口二路居住。刘知侠在垂暮之年又以超人的毅力，完成了40万字的长篇小说《沂蒙飞虎》和40万字的《知侠中短篇小说选》。

刘知侠还非常关心年轻作者，百忙中经常抽空外出辅导。好客的他和刘真骅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：凡是外地来青岛的老同志、老战友、老朋友，一定要留他们吃饭。因此，他们家里经常住满了客人。

他们家有一间房子被誉为“国际旅行社”，那是给客人住的。他用稿费资助过别人，用稿费缴过3万元党费，而他自己却克勤克俭，艰苦朴素。

过度的劳累让刘知侠身体越来越虚弱，1991年9月，在一次老干部国际形势座谈会上，刘知侠站起来发言，他发言时心情激动，突发脑溢血，倒了下去。

妻子刘真骅赶过来后，在他弥留之际，她握住他的手声泪俱下：“知侠，你不是说，还要和我再过20年吗？”她万般呼唤，他还是走了。坐在书房里，凝视着他的照片，她想起了他们的约定：将来有一天，要把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恋捧出来，献给读者。

刘知侠过世后，刘真骅遵照刘知侠的嘱托，以极大的热情和责任感，整理出版了刘知侠生前的封笔之作《战地日记——淮海战役见闻》，还历时八年呕心沥血编辑出版了五卷250万字的《知侠文集》。

刘真骅本人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也著述颇丰，曾创作了反映当代老年人生活的电视连续剧《夕阳里的故事》，与他人合作创作在青岛拍摄的电视连续剧《杀人街的故事》，改编创作了电视剧《刘知侠与芳林嫂》《小小飞虎队》，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《红嫂》，并拍摄成了电影。

刘真骅尽管年事已高，却以“把花甲当花季”的姿态，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，获得政府和群众的广泛赞誉，先后被评为：中国老年形象大使，山东省十大感动齐鲁老人，青岛市十大华龄之星，健康青岛形象大使等。

2024年3月18日，备受瞩目的“刘知侠长篇小说奖”启动仪式在青岛举行。刘真骅为该奖的设立捐赠了100万元，她充满感情地说：“书的生命比人长，好的作品将为历史铭记，人民不会忘记，读者也不会忘记。”

据《老年文汇报》

史沫特莱积极参与营救丁玲

1928年，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丁玲，和丈夫胡也频从天津出发前往上海。这年年初，美国著名记者艾格尼丝·史沫特莱计划离开欧洲，前往中国和印度深入革命实践。丁玲和史沫特莱，即将在中国红色革命中相遇。

1931年5月，丁玲来到上海格罗希路（今延安路）的一处花园洋房，第一次见到了史沫特莱——丁玲是受邀来接受采访的。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前，史沫特莱已从东北一路南下来到上海，与左翼人士多有接触。丁玲见史沫特莱之前，已将出生仅几个月的儿子送往湖南老家，她自己在不同朋友家东躲西藏，想要离开上海去苏区，此时正在等候党组织回复。作为胡也频的生前伴侣接受采访，丁玲本来态度谨慎，但是史沫特莱很快让她打开心扉娓娓而谈。

两人见面后不久，丁玲接受组织安排留在上海继续左联的工作，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她与史沫特莱一直保持着来往，有的大型抗日集会还是史沫特莱通知丁玲参加的，但是出于安全考虑，丁玲在现场避免与史沫特莱等人交谈。

两年后的暮春，丁玲在上海公

共租界内被捕，随后被秘密押解到南京。被捕三年的经历成为笼罩丁玲一生的阴影。因丁玲被捕后生死未卜，舆论哗然，甚至数度传出她已被杀害的消息。史沫特莱此时正是宋庆龄的助手，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工作。为营救丁玲等人，5月24日，上海《申报》刊登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导人蔡元培等38人的联名电报，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压。

史沫特莱在丁玲被捕后不久去了苏联，对于自己参与营救丁玲一事甚少谈及，但苏珍等海外学者的研究显示，当时已凭借自传体小说《大地的女儿》在国际上声名鹊起的史沫特莱第一时间参与到营救丁玲的行动中。她积极与美国左翼人士取得联系，并召集了一批学者将丁玲的《水》《某夜》等小说译成英文，在《亚洲和美洲》等国际左翼刊物上传播，配合出版丁玲作品选集，提高丁玲的知名度，竭力宣传其被捕一事的严重性，以营造有利于释放丁玲的国内外舆论环境。

通过多方努力，1936年9月，丁玲终于重获自由，随后前往陕北。

据《文汇报》曹晓华/文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

勤劳人 吉祥人


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卢星 王乃亮作